

基于跨语际比较法的 《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上)》成文时间考证

耿春亮, 李会勤

(曲阜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山东 日照 276826)

摘要:厘清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上)》的成文时间,对于研究他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转变、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以及近代中日文化的交流史等学术问题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因此,文章应用跨语际比较法,通过考察河上肇《マルクスの社会主義の理論的体系》的内容和发表时间以及提供其他佐证材料,对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上)》的成文时间加以考证。得出的基本判断是:《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上)》开始撰写时间是1919年3月底4月初,5月其主体部分基本完成;因发生五四运动,拟刊载此文的《新青年》第6卷第5号出版时间从5月延期至9月,使李大钊有时间对此文继续完善,于1919年8月中旬最终定稿。

关键词: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成文时间;河上肇

中图分类号:A8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349X(2022)04-0001-12

DOI:10.16160/j.cnki.tsxyxb.2022.04.001

Textual Research on the Writing Time of *My Marxist View* (Part I) Based on Interlingual Comparative Method

GENG Chun-liang, LI Hui-qin

(School of Marxism, Qufu Normal University, Rizhao 276826, China)

Abstract: Clarifying the writing time of Li Dazhao's *My Marxist View* (Part I) has certain reference value for the study of the transformation of his Marxist world view, the early spread of Marxism in China, the history of modern China-Japanese cultural exchange and other academic issues. With interlingual comparative method, this paper studies the content and publishing time of Kawakami Hajime's *Marxist Socialist Theory* and other supporting material, and then it makes a textual research on the writing time of Li Dazhao's *My Marxist View* (Part I). The basic judgment is that Li Dazhao started to write this article at the end of March and early April of 1919, and he completed the main part in May. *New Youth* had planned to publish this article in its No 5 of Volume 6, but due to the May 4th Movement, the publication was postponed. Therefore, Li Dazhao had more time to improve his work, and came to finalize it in mid-August of 1919.

Key Words: Li Dazhao; *My Marxist View*; writing time; Kawakami Hajime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8BZS096)

作者简介:耿春亮(1977—),男,河南鲁山人,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思想史。

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的发表,“不但表明李大钊完成从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而且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进入比较系统的传播阶段”^{[1]46}。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第1卷)对此文的评价,并且给出了发表时间:“1919年10月(应为9月,笔者注)、11月,李大钊分两期在《新青年》上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1]46}但是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上)》自发表至今,其成文时间学者们尚未达成共识^①。而准确研判《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上)》的成文时间,对于深入开展李大钊何时转向马克思主义以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过程

等问题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因此,本文通过跨语际比较法追溯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上)》的思想源流,在学界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对其成文时间作进一步考证。

一、河上肇《マルクスの社会主義の理論的体系》的发表时间

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上)》是以河上肇《マルクスの社会主義の理論的体系》为蓝本的^②。《マルクスの社会主義の理論的体系》共分七次^{[2]234-309},连载于河上肇独立创办的《社会问题研究》上,具体信息如表1所示。

表1 河上肇《マルクスの社会主義の理論的体系》的发表情况

章次、标题	所刊期次和页码	发表时间
其一、緒言	《社会问题研究》第1册 (第16—32页)	1919年(大正八年) 1月20日
其二、緒言(前を承く)——其二、唯物史観又は経済的史観の解説(後に続く)	《社会问题研究》第2册 (第54—66页)	1919年(大正八年) 2月15日
其三、唯物史観に関しマルクス自身の書き下せし公式の解説(此篇前を承けて猶ほ後に続く)	《社会问题研究》第3册 (第83—98页)	1919年(大正八年) 3月15日
其四、唯物史観と階級争闘説との関係——階級争闘説の解説	《社会问题研究》第6册 (第208—220页)	1919年(大正八年) 6月1日
其五、唯物史観及び階級争闘説に本くマルクスの社会観の要領	《社会问题研究》第7册 (第347—352页)	1919年(大正八年) 7月8日
其六、労働価値論大意——剰余価値の成立(剰余価値の意義——剰余価値は生産行程に於て成立す——必要労働及び剰余労働の区別——剰余価値成立論とマルクスの社会主義との関係)	《社会问题研究》第8册 (第366—392页)	1919年(大正八年) 9月8日
其七、剰余価値の実現——資本主義的経済組織の必然的崩壊(剰余価値成立の困難組織——剰余価値実現の困難——社會主義的新組織の実現の爲の物的及び人的条件)	《社会问题研究》第10册 (第343—354页)	1919年(大正八年) 11月20日

① 详见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的第一个题解(载于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注《李大钊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40—41页)。题解提示,有学者认为李大钊是在1919年8月下旬或9月初完成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而题解的判断是:“该文的写作与基本完成时间,李大钊势必确定不移地安排在1919年5月即该纪念号预定的出版集稿之前。”而且杨琥在《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若干问题的探讨——兼谈《新青年》“马克思研究”专号的编辑和印行》(载于牛大勇、欧阳哲生主编:《五四的历史与历史中的五四》,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一文中也以多方史料考证,证明李大钊撰写此文的时间是1919年5月之前。本文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以跨语际比较法对李大钊撰写《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上)》一文的时间作进一步的考证。

② 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除以河上肇的《マルクスの社会主義の理論的体系》为思想来源外,其他思想理论来源可参见王宪明的《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上篇)思想来源管窥》(《政治思想史》2011年第3期)和《李大钊马克思主义经济观的学术来源探析——〈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下篇研读》(《政治思想史》2021年第4期)两文对它的考证。

二、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上)》的成文过程

追溯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上)》的思想源流,对于厘清李大钊撰写《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上)》的时间和过程至关重要。

《マルクスの社会主義の理論的体系》由罗琢章(使用的是文言文)、藉碧(使用的是白话文)接续翻译成中文,名为《马克司社会主义之理论的体系》,于1919年8月5日至8日、11日、22日、26日、27日;9月3日、5日、6日、8日、12日;10月28日;11月1日、4日、12日、13日;12月23日、24日连载在《时事新报·学灯》上。《マルクスの社会主義の理論的体系》最初的原稿,是河上肇在1918年8月6日晚上于京都帝国大学夏期讲习会上演讲的演讲稿,发表时原演讲内容有所增补,对此他作了简短的说明:

本篇は、大正七年八月六日夜、京都帝国大学夏期講習会の科外講演として、約二時間に

亘り、余の朗読したる原稿一当夜は時間の不足の爲め、朗読を省略したる部分少からず一に、若干の増補を爲したるものにて、内容は大體図部に分る。即ち第一は緒言にして、第二はイルクスの歴史觀、第三は其經濟論、第四は其政策論である。^{[2]234}

考察李大钊在1918年8月前后的行程可知,李大钊亲自到日本聆听河上肇的这次演讲的可能性不大。因此,可以推知,李大钊撰写《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应是在河上肇发表《マルクスの社会主義の理論的体系》的《緒言》之后,即1919年1月20日之后才开始的。至于李大钊具体何时开始撰写,本文将对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上)》、河上肇的《マルクスの社会主義の理論的体系》、罗琢章、藉碧的《马克司社会主义之理论的体系》三文进行比较来推测判断。为节省篇幅计,只举出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上)》部分段落作为例证,结果详见表2。

表2 三文部分文句的比对结果

《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上)》	《マルクスの社会主義の理論的体系》	《马克司社会主义之理论的体系》
第一部分	其一、緒言	
但自俄国革命以来,“马克思主义”几有风靡世界的势子,德、奥、匈诸国的社会革命相继而起,也都是奉“马克思主义”为正宗。“马克思主义”既然随着这世界的大变动,惹动了世人的注意,自然也招了很多的误解。	今日私が此問題を選んだ理由は種々あるが、共第一理由は、近頃露西亞に革命が起つて、共がマルクス主義の影響だと称せられて居るが爲である。露西亞ではマルタス主義に本く革命が起つたと称せられて居るのに、そのマルクス主義の何物たるやは、来だ我国に於て広く且正しく知られて居らぬ。殊に近頃露国の廢帝を銃殺したなど、云ふ報道がある為に、斯かる事までマルクス主義と密接なる關係あるものと如くに考へらると傾向が、或は在るであらうと思ふが、此の如きは甚しき誤解であるから、其等の誤部を正し、時事問題の正当なる理解の為に、多少の参考材料を提供したいと云ふのが、私が此題目を選んだ第一の理由である。	余以马克司社会主义之理论的体系为题,盖有种种之理由存焉。其一,近頃俄国之革命,乃受马克司主义之影响也。夫俄既本马克司主义而起革命矣,然马克司主义究为何物,恐知者绝鲜。且最近俄廢帝被害噩耗传来,有谓此事与马克司主义有密接之关系者,误解极矣。余为此误解故,故提供若干之参考材料,以冀得时事问题知正当理解焉。此余选此问题之理由一也。
我们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虽然极其贫弱,而自一九一八年马克思诞生百年纪念以来,各国学者研究他的兴味复活,批评介绍他的很多。	第二に、今年(大正七年、一九一八年を指す)はマルクスが生れてから、正に満百年に相当して居るから、一には彼の誕生を記念したいと云ふ趣旨で、此題目を選んだ。	其二、今年(大正七年即一九一八年)距马克司之生正满百年,为纪念其诞生之故,是余选此问题之理由二也。

续表

《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上)》	《マルクスの社会主義の理論的体系》	《马克司社会主义之理论的体系》
第二部分 由经济思想史上观察经济学的派别,可分为三大系,就是个人主义经济学、社会主义经济学与人道主义经济学。	其一、緒言 抑:経済学なるものは、私の見る所に依ると、大別して個人主義の経済学、人道主義の経済学、社会主義の経済学の三の流派とすることが出来る。	依余所见,经济学可大别为个人主义经济学、人道主义经济学及社会主义经济学之三派。
第三部分 马氏社会主义的理论,可大别为三部:一为关于过去的理论,就是他的历史论,也称社会组织进化论;二为关于现在的理论,就是他的经济论,也称资本主义的经济论;三为关于将来的理论,就是他的政策论,也称社会主义运动论,就是社会民主主义。	其二、緒言(前を承く)——其二、唯物史観又は経済的史観の解説(後に続く) 今其等の關係に就き姑く私の見る所を述ぶるならば、畢竟マルクスの社会主義は、過去に関する理論と、現在に関する理論と、将来に関する理論と、此三者に分ち得ることゝ思ふ。	马克司之社会主义,其理论当分为三:即一关于过去之理论。二关于现在的理论。三关于未来之理论是也。
第五部分 (一)见于《哲学的贫困》中的: 经济学者蒲鲁东氏,把人类在一定的生产关系之下制造罗纱、麻布、绢布的事情,理解的极其明瞭。	其四、唯物史観と階級争闘説との關係——階級争闘説の解説 経済学者ブルードン氏は、人間は一定の生産關係の下に於て羅紗、麻布、絹布を製造するものなることを、極めて明瞭に理解した。	“经济学者布尔董氏者,人类于一定生产关系之下所制造罗纱麻布绢布等物颇能理解。”
(二)见于《共产党宣言》中的: 凡以前存在的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竞争的历史。希腊的自由民与奴隶,罗马的贵族与平民,中世纪的领主与农奴,同业组合的主人与职工,简单的说,就是压制者与被压制者,自古以来,常相反目,而续行或隱然,或公然不断的争斗,总是以全社会的变革,或以相争两阶级的共倒结局的一切争斗。	其二、緒言(前を承く)——其二、唯物史観又は経済的史観の解説(後に続く) 総て過去の歴史は階級争闘の歴史である。「希臘の」自由民と奴隸、「羅馬の」貴族と平民、「中世の」領主と農奴、同業組合の親方と職人、鷹手に言へば压制者と被压制者とは古来常に相反目して、或は隱然の、或は公然の、絶ふることなき争闘——何時も全社会の革命的变革を以て、或を相争ひつゝ、兩階級の共寫を以て、其局を結ぶに至る所の一の争闘——を続けて居る。	凡过去之历史,皆阶级争斗之历史。(希腊的)自由民与奴隶,(罗马的)贵族与平民,(中世纪的)领主与农奴,同业组合之头目与工匠,简单言之,则压制者与被压制者,自古以来,当相反目,或隱然的,或公然的,而有不绝之争斗。无论何时,皆以全社会之革命的变革,或相争之两阶级同时并倒,而其结局,再以一争斗续之。
(三)见于《经济学批评》序文中的: 人类必须加入于他们生活上必要的社会的生产,一定的、必然的、离于他们的意志而独立的关系,就是那适应他们物质的生产力一定的发展阶段的生产关系。	其三、唯物史観に関しマルクス自身の書き下せし公式の解説(此篇前を承けて猶ほ後に続く) 人類は、彼等の生活の社会的生産に於て、一定の、必然的の、彼等の意志より独立したる關係に、即ち彼等の物質的生産力の一定の發展階段に適應する所の生産關係に、入り込むものである。	人类在彼等生活社会的的生产一定的、必然的、由彼等之意志,而为独立之关系。换言之即入于适应彼等物质的生产力一定之发展阶级所有之生产关系也。

续表

《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上)》	《マルクスの社会主義の理論的体系》	《马克司社会主义之理论的体系》
第六部分	其四、唯物史観と階級争闘説との關係—— 階級争闘説の解説	
与他的唯物史观很有密切关系的,还有那阶级竞争说。	援てマルクスの唯物史観又は経済的史観の何物たるやは、以上を以て略ぼ大体の説明を終へたのであるが、猶之に關聯して説明するの必要あるは、マルクスには別に階級争闘説なるものあれど、この階級争闘説と、かの経済的史観との關係如何と、言うことである。	夫马克司之唯物史观或经济的史观之为何物,既为大体的说明矣。其与之有关系而尚有说明之必要者,即阶级争斗是也,亦即阶级争斗与经济的史观之关系如何是也。

通过比对分析,以马克思主义的术语衡估,可以得出的基本结论是:李大钊撰写《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上)》应该直接参考了河上肇《マルクスの社会主義の理論的体系》的日语原文。其大致的撰写过程如下。

从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上)》第一部分展示的撰写此文的动因来分析,其中有两个动因与河上肇撰写发表《マルクスの社会主義の理論的体系》的缘由相似。其一,两人都是为纠正俄国十月革命以来时人对马克思主义存在的误解而作;其二,两人都是为纪念马克思的诞辰而作。李大钊撰写的第三个动因是为编辑“马克思研究”专号,向世人集中介绍马克思主义,而河上肇演讲的第三个缘由是为了科学总结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虽然动因有所差异,但二人最终目的都是想向世人科学介绍马克思主义。因此从二人文章中表现出来的相似的动因或缘由分析,李大钊撰写《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上)》第一部分的内容不会早于1919年1月20日,即河上肇《マルクスの社会主義の理論的体系》的《緒言》发表的时间。

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上)》第二部分的部分段落与河上肇的《マルクスの社会主義の理論的体系》的《緒言》部分内容一致,其余段落亦可以在《緒言》中找到相似的内容。因此,得出的初步结论是:李大钊撰写《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上)》时是以河上肇的《マルクスの社会主義の理論的体系》为参考文献的,而撰写的时间应该在《緒言》发表之后,即1919年1月20日《社

会问题研究》第1册出版之后。

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上)》第三部分的部分内容参照的是河上肇《マルクスの社会主義の理論的体系》的《緒言(前を承く)》——其二、唯物史観又は経済的史観の解説(後に続く)》,后者发表于《社会问题研究》第2册,出版时间是1919年2月15日,与第1册的出版时间仅隔25日。因此,李大钊撰写《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上)》第三部分的时间不可能早于1919年2月15日。

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上)》第五部分关于《共产党宣言》的内容参照的是河上肇《マルクスの社会主義の理論的体系》的《緒言(前を承く)》——其二、唯物史観又は経済的史観の解説(後に続く)》。因此,李大钊撰写《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第五部分的时间也不可能早于1919年2月15日。

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上)》第五部分引用的《哲学的贫困》来自河上肇《マルクスの社会主義の理論的体系》的《唯物史観と階級争闘説との關係——階級争闘説の解説》,而它发表在《社会问题研究》第6册,时间是1919年6月1日。说明李大钊撰写此文拖延的时间比较长。因受五四运动的影响,李大钊轮值编辑的《新青年》第6卷第5号出版发行延期,使他有充分的时间来修改此文,当他看到出版的《社会问题研究》第6册仍有可利用的资料时,便用以充实自己的文章内容,使其更有理论性和说服力,毕竟这是中国第一篇较为科学完整地介绍

马克思主义的文章。

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上)》第五部分引用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在原文中是《〈经济学批评〉序文》,根据现在的译法更改为《〈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部分段落应是参考了河上肇《マルクスの社会主義の理論的体系》的《唯物史觀に關しマルクス自身の書き下せし公式の解説(此篇前を承けて猶ほ後に続く)》的内容,而河上肇的这部分内容刊载于1919年3月15日出版的《社会问题研究》第3册。因此,李大钊的引用时间也应在1919年3月15日之后。

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上)》第六部分的内容参照的是河上肇《マルクスの社会主義の理論的体系》的《唯物史觀と階級争闘説との關係——階級争闘説の解説》,也应是1919年6月1日它发表之后李大钊才开始写作的,亦即收到《社会问题研究》第6册之后开始的。

三、厘清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上)》成文时间的主要依据

第一,河上肇在1919年1月独立创办《社会问题研究》,新杂志从创办到为世人所知需要一定的时间,《社会问题研究》到第3册开始大量发行^①,李大钊(时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订购并查阅此刊^②。李大钊此时期极为关注十月革命所开辟的人类社会新道路,对俄国布尔什维克所“奉德国社会主义经济学家马客士(Marx)为宗主的”^{[3]364}马克思

主义十分留意,在还不能直接获得马克思经典著作原文的情况下(从五四新文化时期中国时人所依据的思想资源来看,日本学者所翻译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文本占主要地位),阅读与中国相邻的日本学者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著述亦较为便利,何况李大钊具有在日本留学的经历,就更易关注日本的社会主义运动^③。

第二,河上肇的《マルクスの唯物史觀》原载于1919年3月15日出版的《社会及国体研究録》1卷1号,渊泉将其翻译成中文《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刊载于1919年5月5日、6日、8日《晨报》第7版的“马克思研究”栏目内。通过对两文的比对可知,渊泉在翻译河上肇的《マルクスの唯物史觀》时,还参考了河上肇《マルクスの社会主義の理論的体系》中《緒言(前を承く)——其二、唯物史觀又は經濟的史觀の解説(後に続く)》《唯物史觀に關しマルクス自身の書き下せし公式の解説(此篇前を承けて猶ほ後に続く)》这两部分的内容,它们分别发表在《社会问题研究》第2册、第3册,为1919年2月15日、3月15日出版。河上肇翻译马克思的《劳动与资本》并将其发表于1919年4月份出版的《社会问题研究》第4册,食力(尚不能考证其真实身份)又将其翻译成中文,从5月9日至31日登载于《晨报》第7版的“马克思研究”栏目内。

以上说明河上肇在《社会问题研究》上所登

① 据渊泉调查:“《社会问题研究》是河上肇博士独办底,专门研究马克思主义,每月可以销得二万多份,不独为学术研究杂志之中所罕见,即在政治评论杂志之中,也很少。这个杂志,单载河上肇博士自身论文,所以同普通杂志大不相同。”见渊泉:《东游随感录》(十七),《晨报》1919年11月6日,第7版。

② 《鲁迅日记》1919年4月11日记载:“下午收《新村》一本。”见《鲁迅全集》第15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66页。《钱玄同日记》1919年10月2日记载:“下午一时到大学去,接到日本出版的《新村》杂志。”见杨天石主编:《钱玄同日记》,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351页。鲁迅、钱玄同两人收到《新村》的记载,说明中日之间报章杂志邮寄非常顺畅。

③ 杨昌济在1919年10月31日记载:“李守常谓日本武者小路实笃是一思想家,又谓吉野作造、界利彦(应为堺利彦,笔者注)、室伏高信、河上肇,皆日本学者中之杰出者。”见杨昌济著,王兴国编注:《杨昌济集》,湖南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679页。杨昌济虽是几个月后的记载,但也说明李大钊对日本学者的学术研究是比较熟悉的。

载之文,从发表到翻译成中文并刊载于中国报刊所需时间为一个多月。河上肇的马克思研究著述在1919年3月就引起了中国时人的注意,此时他们可以阅读河上肇的《社会问题研究》并加以利用,不然不可能此刊4月发文,5月即可看到中文译文。虽无直接证据证明李大钊阅读了《社会问题研究》,但考虑到李大钊与渊泉的关系及他此时期思想的转变,极有可能在1919年3月他就开始阅读此刊,并为撰写《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作准备。

第三,《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上)》第五部分关于《共产党宣言》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的内容均出自河上肇的《マルクスの社会主義の理論的体系》,分别发表于1919年2月15日和1919年3月15日。《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上)》第五部分作为一个整体,李大钊不可能在2月15日之后的几天之内开始撰写,然后还要等待将近一个月再来完整阐述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因为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主要体现于《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之中,李大钊和中国其他时人在阐述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之时,基本上围绕着《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观点展开。从而断定《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上)》第五部分应在3月15日之后开始撰写。

依此类推,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上)》前三部分虽以河上肇《マルクスの社会主義の理論的体系》的《緒言》《緒言(前を承く)——其二、唯物史観又は経済的史観の解説(後に続く)》为蓝本,但其写作时间也应是在1919年3月底或4月初。主要依据是,其一,李大钊撰写《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是向时人介绍马克思学说的理论体系,以纠正时人对其的误解。这就要对马克思学说的各个部分有较为详尽的说明,若只在前三部分介绍马克思主义在经济思想史的地位和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论,而没有唯物史观的支撑,显然不能达到撰写此文的目的。其二,日本邮件邮寄到中国所需时间大致是5天左右(通过《觉悟》“通信栏”中施存统从日本发回的信件所留的时间得知,在此不作详细的证明),河上肇的《社会问题研究》第

3册是1919年3月15日出版的,邮寄到北京是3月20日之后。李大钊应该是在收集到《社会问题研究》前三册后才着手撰写《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的。

因此,《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上)》第一至五部分应在1919年3月底或4月初开始撰写,以便作为“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系列研究之一,成为拟5月出版的为马克思诞辰而策划的“马克思研究”专号中的重要一文。

第四,《新青年》第6卷第5号由李大钊负责编辑,将之策划为“马克思研究”专号。第5号无论是在5月份出版或其他月份出版,都需要他亲自撰写一篇有关马克思主义的文章,既然他向其他人征稿或转载其他报刊有关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文章,那么自己不撰写,与情理不符。这从李大钊撰写《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的动因是为纪念马克思诞辰即可窥视,他要在马克思百年诞辰以来世界各国学者研究马克思主义趣味正浓之时,将马克思学说介绍给中国读者。

《新青年》第6卷第5号“马克思研究”专号中的《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与贞操问题》转载的是《新中国》第1卷第1号中的《女子贞操的金钱价值》一文,发表时间是1919年5月15日,作者是陈启修;渊泉翻译的河上肇的《近世社会主义鼻祖:马克思奋斗の生涯》一文转载于1919年4月1日至4日的《晨报》;另一篇渊泉翻译的河上肇的《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也转载于1919年5月5日、6日、8日的《晨报》。在李大钊的支持和指导下,1919年5月5日《晨报》第7版开设了“马克思研究”栏目,其旨趣是为纪念马克思的诞辰,刊载马克思主义相关内容的文章。李大钊指出:“五月五是马克思的诞辰日。今年的五月五日,又正是他诞生百年的誕生日,也是世界的劳工共和国的誕生日。我们应该纪念这个五月,纪念这一八一八年五月五日出生的人物,纪念这一八九〇年五月一日创行的典礼,更纪念这一九一八诞生的世界新潮。”^{[3]455-456}

若没有五四运动的影响,《新青年》第6卷第5号作为“马克思研究”专号来纪念马克思诞

辰会在 1919 年 5 月出版,那么转载上述三文是很自然的事情。转载的上述三文均是 5 月 15 日或之前发表于其他期刊的文章,而在这之后至 9 月第 5 号出版之前其他期刊上有关马克思主义的文章为数不少,为什么没有转载呢?或可说明 5 月 15 日的稍后几日李大钊已经将第 5 号的文稿基本收齐并开始编辑了。

第五,《新青年》第 6 卷第 5 号其他作者的写作时间,也可作为李大钊开始撰写《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上)》一文时间的重要参照。梳理第 5 号的全部作品后发现,留下写作时间的有:启明的《俄国革命之哲学的基础(下)》文末附记,标注的写作时间为 1919 年 3 月 31 日;胡适的《送任叔永回四川》写作时间为 1919 年 4 月 18 日;胡适的《一颗星儿》写作时间为 1919 年 4 月 25 日夜。另外,留下时间线索的还有鲁迅撰写的小说《药》,据《鲁迅日记》1919 年 4 月 25 日记载:“夜成小说一篇,约三千字,抄訖。”^[4] 这给出了《药》的完成时间及交稿时间。因为是月刊,需要提前一个月或延至本号出版的当月交稿。因此,3 月到 4 月或最迟延至 5 月是第 5 号的交稿时间。如此,欲在第 5 号发表,李大钊撰写《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当然需要提前作准备。根据《新青年》其他号作者所留时间线索推断,基本上是出版前的一两个月内交稿,这似乎已成惯例。作为同人杂志时期的《新青年》(从第 4 卷第 1 号至第 6 卷第 6 号),编辑部的同人大致会遵循相同的交稿流程,试想某人担任某号的轮值编辑,如果自己或其他同人不能按时交稿,那么该号则不能出版发行,同人杂志将难以为继。

第六,考察《新青年》的出版流程,亦可作为李大钊开始撰写《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上)》一文时间的重要参考。查《钱玄同日记》有关《新青年》的几条记载,基本可以厘清其出版的流程。

1918 年 1 月 2 日记载:“午后至独秀处检得《新青年》存稿。因四卷二期归我编辑,本月五日须齐稿,十五日须寄出也。”“选录尹默、半农诸人的白话诗数首始睡。”^{[5]326}

1 月 3 日记载:“午后因娟贞出门,携《新青

年》四卷二号之稿回家中检阅,计可用者不及五十 Pago,尚须促孟和、独秀多撰,始可敷用。”^{[5]326}

1 月 4 日记载:“灯下录兼士致我一书‘论新文学与新字典’,上加以按语,拟登《新青年》。又撰一通信,致《新青年》同人者,拟用中西两种句读,西六为,;,:.?! (其中. 一种太小,不甚醒目,如句后不空拟改用‘。’,若空即用‘.’),中二:、。”^{[5]327}

1 月 5 日记载:“日前嘱人抄录吴稚璠之谈话中论‘旅欧俭学之情形及移家就学之生活’一段,以备登《新青年》四卷二号,今日已抄就大半,因取归校点。黄昏撰林语堂之《汉字索引制》跋一篇,约千余字,亦预备登《新青年》者。”^{[5]327}

1 月 10 日记载:“将《尝试集》序修改一番,即登入《新青年》四卷二号。”^{[5]328}

1 月 12 日记载:“独秀交来《新青年》用稿一篇,题为《人生真义》,约千八百字左右,做得很精,又守常《论俄国革命与文学》一稿,可留为第三号用。”^{[5]328}

1 月 13 日记载:“下午作致陶孟和信,论 Esperanto,写至十时许始完,但写的甚不惬意,脑子甚乱,即再做也做不好,就是这样罢。又答李锡余信,约四百字,《新青年》四卷第二号之稿齐矣,明日当交与独秀。”^{[5]328}

1 月 14 日记载:“午后三时半访半农,偕其同往独秀处,将《新青年》四卷二号之稿交给他,请他加信寄去。”^{[5]329}

1 月 21 日记载:“《新青年》四卷一号已寄到民然楼。Jan. 15 之期出版,其中所用新式圈点居然印得很像样子,可喜可贺!”^{[5]329-330}

《钱玄同日记》这几日的日记清楚地记载了《新青年》第 4 卷第 2 号的收稿、编辑流程,钱玄同作为轮值编辑,收稿、用稿均由其负责。表 3 是《新青年》4 卷 2 号各文的收稿时间。

表 3 表明,《新青年》第 4 卷第 2 号的收稿从 1917 年 12 月 2 日始至 1918 年 1 月 13 日完成,14 日交于陈独秀并寄至上海。因此,《新青年》的收稿、编辑会在出版前一个月内完成。《钱玄同日记》记载收到《新青年》第 4 卷第 1 号

的时间为1918年1月21日,如果杂志1月15号从上海群益书社寄出,寄至北京大约用了一周的时间。

表3 《新青年》第4卷第2号各文的收稿时间

作者	篇名	收稿时间
李锡余	《致玄同》	1917.12.2
沈尹默	《宰羊》	1918.1.2
沈尹默	《落叶》	1918.1.2
刘半农	《车毡》	1918.1.2
胡适	《老鸦》	1918.1.2
刘半农	《游香山记事诗》	1918.1.2
沈尹默	《大雪》	1918.1.2
林语堂	《汉字索引制说明》	1918.1.5
吴敬恒	《论旅欧俭学之情形及移家就学之生活》	1918.1.5
沈兼士	《新文学与新字典》	1918.1.5
钱玄同	《句读符号》	1918.1.5
陶履恭	《新青年之新道德》	1918.1.6
钱玄同	《尝试集序》	1918.1.10
陈独秀	《人生真义》	1918.1.12
钱玄同	《致孟和》	1918.1.13
钱玄同	《答李锡余》	1918.1.13

李大钊作为《新青年》第6卷第5号的轮值编辑,按照正常的《新青年》出版流程,其应该在1919年4月15日之前基本完成收稿工作。虽然《新青年》第6卷各号均出现延期出版的情形,但既然第5号是“马克思研究”的专号并为纪念马克思诞辰而设,为了赶上这号,李大钊势必会在4月15日之前就要大致完成《我的马克思主义观》。

下面仍通过《钱玄同日记》中的有关记载考察《新青年》第6卷各号的收稿、编辑情况,主要考虑的是收稿、编辑时间是确定稿件写作时间的主要依据,而出版、发行会受到其他因素的制约不能按时进行,从而缺乏参照价值。

1919年1月11日记载:“独秀说六卷一号之《新青年》中有叔雅译的《苏克尔精神之不可思议》,约一万多字。此外稿件已近很多,十五日可以寄发。”^{[5]340}(查第6卷第1号,刘叔雅此稿应该是推迟到第2号才发表的其所翻译的德国赫克尔的《灵异论》,笔者注)

1月13日记载:“晚为《新青年》六卷一号作《随感录》两条,论上海通信教授典故

之事。”^{[5]341}

《新青年》第6卷第1号标注的是“(民国八年)一九一八(应为‘九’,笔者注)年一月十五日”发行,但根据《钱玄同日记》中的两条记载,1919年1月15日,陈独秀才将第6卷第1号的稿件邮寄至上海,说明《新青年》的文稿收集、编辑的时间有所变动,这与前述的提前一个月的时间收稿有所不同,但仍要在本月15日之前完成文稿的收集工作。

1月22日记载:“《新青年》五卷五号已寄到。”^{[5]343}

2月3日记载:“午前访沈氏兄弟,因知《新青年》五卷六号已到,我应得的在他那边,故往取也。”“见李子九的信,他极赞成《新青年》,他寄来一篇论去兵的文章,拟采登《新青年》。”^{[5]345}(李文登于《新青年》第6卷第2号,笔者注)

2月4日记载:“灯下作答周时敏去夏来信,为登《新青年》之用。”^{[5]345}(此文登于《新青年》第6卷第2号“通信栏”之内,笔者注)

2月5日记载:“午后到大学去,无一人。启明留下一信,内有他做的四首诗,要登《新青年》六卷二号。他的诗做得比适之、半农都好。这四首中以《小河》一首长诗尤佳。”^{[5]345}(周作人的《小河》作于1919年1月21日,登于《新青年》第6卷第2号,笔者注)

以上从《钱玄同日记》的记载可以推断《新青年》出版发行出现了迟滞。《新青年》第5卷第5号出版发行的时间应是1918年11月15日(杂志标注的时间是10月15日,与第4号的时间相同,这显然是编校或印刷时的错误所致),但迟至1919年1月22日钱玄同才收到该号;第5卷第6号出版发行的时间应是1918年12月15日,钱玄同收到的时间是1919年2月3日。

以下通过《新青年》第6卷第2号、第3号、第4号作者稿件写作完成的时间线索(见表4—6),推测李大钊开始撰写《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上)》的时间,若同人大致遵循同样的时间节点完成稿件的话,李大钊也概莫能外。

表 4 《新青年》第 6 卷第 2 号部分
稿件的完成时间

作者	篇名	完成时间
周作人	《小河》	1919. 1. 21
周作人	《可爱的人》	1919. 1. 31
钱玄同	《致时敏》	1919. 2. 4
黄凌霜	《致玄同》	1919. 2. 7
钱玄同	《英文“SHE”字译法之商榷》	1919. 2. 8
钱玄同	《致凌霜》	1919. 2. 10
钱玄同	《回信》	1919. 2. 10
S. F	《姚叔节之孔经谈》	1919. 2. 11
钱玄同	《回信》	1919. 2. 12
周作人	《致玄同》	1919. 2. 13
钱玄同	《致启明》	1919. 2. 14
仲密	《再论“黑幕”》	1919. 2. 15
胡适	《不朽》	1919. 2. 19

表 5 《新青年》第 6 卷第 3 号部分
稿件的完成时间

作者	篇名	完成时间
周作人	《两个扫雪的人》	1919. 1. 13
周作人	《微明》	1919. 1. 23
周作人	《路上所见》	1919. 1. 24
周作人	《北风》	1919. 2. 28
胡适	《致俞平伯》	1919. 3
彭啸殊	《故迷》	1919. 3

表 6 《新青年》第 6 卷第 4 号部分
稿件的完成时间

作者	篇名	完成时间
仲密	《思想革命》(录《每周评论》第十一号)	1919. 3. 2
陈大齐	《回王扶五信》	1919. 3. 14
胡适	《应该》	1919. 3. 20
胡适	《胡适答蓝志先书》	1919. 3. 23
鲁迅	《孔乙己》	1919. 3. 26
齐耀琳	《什么话》	1919. 4. 9

《新青年》第 6 卷第 2 号至 4 号部分稿件的写作完成时间可以证明,《新青年》自 1919 年第 6 卷开始,每月的稿件收集、编辑工作一般会在当月完成,第 4 号的部分稿件在 3 月底或 4 月初即已完成。顺理成章,第 5 号的稿件会在 4 月或 5 月完成。

从 1919 年 2 月 12 日至 9 月 11 日钱玄同的日记中断,9 月 12 日恢复,并从 9 月 19 日起开始有第 6 卷第 6 号稿件的编辑情况的记载。

9 月 19 日记载:“八时回舍编辑《新青年》六卷六号稿。夜一时睡。”^{[5]348}

9 月 22 日记载:“下午二时起,回舍,编辑《新青年》稿。”^{[5]349}

10 月 5 日记载:“下午三时至胡适之处,因仲甫函约《新青年》同人今日在适之家中商量七卷以后之办法,结果仍归仲甫一人编辑。”^{[5]351}

10 月 15 日记载:“七时校《新青年》稿。”^{[5]353}

10 月 17 日记载:“十时编《新青年》稿,十二时睡。”^{[5]354}

10 月 20 日记载:“下午二时送《新青年》稿到同文去。三时回家,因今日沈尹默夫人请娟贞吃饭,我在家编辑第六卷六期之《新青年》稿。”^{[5]354}

10 月 24 日记载:“十一时编《新青年》稿。写《答陈颂平信》。”“七时回舍,编《新青年》稿,作了一篇《论中国当用世界公历纪年》。”^{[5]355}

10 月 25 日记载:“下午一时送《新青年》稿到同文去。”^{[5]355}

11 月 3 日记载:“四时章洛声送来《新青年》第六卷第六号通信栏排好稿,叫我校对。”^{[5]355}

《新青年》第 6 卷第 6 号的编辑工作,大概从 9 月 19 日一直持续至 11 月 3 日。说明第 6 号稿件大都在 9 月到 10 月之间写作完成。

根据以上几方面的信息,大致可以确定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上)》的基本完成时间是 1919 年 5 月。李大钊不可能在 1919 年 4 月就能预测到 5 月会发生五四运动,进而推迟第 6 卷第 5 号稿件的收集、编辑工作,并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上)》推迟到 7 月、8 月才开始撰写定稿,这在事实上、逻辑上是讲不通的。

第七,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上)》第五部分引用的《哲学的贫困》以及第六部分的内容,均借鉴了 1919 年 6 月 1 日出版的《社会问题研究》第 6 册中的内容,说明因为《新青年》的延期出版,李大钊在 6 月或之后仍在利用已经出版的有关马克思主义研究资料不断充实自己

的研究。据此推测,李大钊开始撰写《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上)》时所秉持的信念,是要持续研究马克思主义。李大钊为将问题阐释清楚,只有在收集到的资料能够支撑起“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时才会开始撰写,并持续收集资料以不断完善。

有学者将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上)》第七部分中提到的“参照《每周评论》第三十三号欧游记者明生君通信”^{[6]20}作为依据之一,推断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上)》“其写作和定稿时间,应为1919年7月底到8月上旬,而不可能在1919年5月之前”^[7]。经过核对《每周评论》第33号(出版日期为1919年8月3日)欧游记者明生君通信的内容,发现李大钊所引述的“大战起来以后,工联一时虽停止活动,战事既熄,他们又重张其鼓。听说铁路人员总会、交通劳动者(专指海上劳动者)联合会和矿

夫联合会三种工联联合起来,向政府及资本家要求种种条件,声势甚猛”^{[6]20}并没有出现在此号中,而是出现在《每周评论》第34号(出版时期为1919年8月10日)欧游记者特别通信中,为“英国的工联(用严又陵的译名)在战争的时代一时停止活动,现因战争休息又奋发起来。诸君读新闻纸上关于英国劳动界的消息,自然可以看出来的。近来有三种工联联合起来对于政府对于资本家要求种种条件。那三个工联?就是铁路人员总会、交通劳动者(专指海上劳动者)联合会和矿工联合会,他们的联合势力非常大”^[8]。根据划线部分的内容可以断定,李大钊引用的是《每周评论》第34号的内容,这说明《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上)》的定稿时间大概为8月中旬,而不是8月上旬。

《新青年》第6卷第5号既然因五四运动延期至9月出版^①、8月中旬要完成稿件的编辑工

① 《新青年》第6卷第5号实际出版发行的时间应为1919年9月10日前后,依据是其上刊登的《〈新青年〉再版预约》广告信息:“本志出版前后五年,已经印行三十三号,提倡新文艺,鼓吹新思想,通前到后,一丝不懈,可算近来极有精彩的杂志。识见高超的人,都承认本志有改造思想的能力,是中国最有价值的出版物,于是买的一天多一天。从前各号,大半卖缺,要求再版的,或亲来,或通信,每天总有几起。因此,敝社发行前五卷再版的预约卷,把前三卷先出,供读者的快览,后两卷因印刷来不及,到二次才能兑清。预约的时间,不能过久,若蒙光顾,还请从速。预约办法:册数:全部——自一卷一号至五卷六号止,计三十号,分作五厚册装订。价值:预约——每部实值银四元,一次交足;书出后——每部实值银五元,不折不扣。时期:预约期——自登报日起,至阳历九月二十日止,外埠以发信日为准;兑书期——阳九月底,先兑前三卷,阳十一月十日,兑清后两卷。寄费:国内——每部五角三分;国外——日本与国内同,其余各国,每部一元六角。”其中提到的预约期自登报日起至9月20日止,联系到群益书社的“生意经”,第5号至少提前10天就要出版发行,以便使更多的人有充足的时间预定《新青年》的合订本,使预定广告发挥更长的时效,从而使“生意”多多达成。经查《新青年》第6卷第5号的出版广告最早登载于1919年9月20日的《时事新报》第1版,广告特标明“新出六卷五号要目”,此后23日、30日也刊登了此“新出六卷五号要目”。其合订本的广告最早登载于1919年8月15日的《时事新报》第1版,具体日期为8月15日、19日、23日、27日、29日;9月6日、8日、12日、14日、16日、19日、20日。《新青年》第6卷第5号出版广告登载于1919年9月22日《民国日报》第1版;9月18日至30日、10月1日的《晨报》第1版。《新青年》第6卷第6号标注的时间是1919年11月1日,而出版广告登载于1919年11月9日的《晨报》第1版。根据北京大学图书馆登录室第一部的布告提供的信息:“下列杂志昨日到馆,《新青年》第六卷第五期,5月出版,2册。”(见《北京大学日记》1919年9月17日,第2版),可见北京大学图书馆收到《新青年》第6卷第5号的时间是9月16日。从《钱玄同日记》的有关记载可知,《新青年》由上海邮寄至北京大约需一周时间。根据这些时间线索大致判断《新青年》第6卷第5号的出版发行时间为1919年9月10日左右,即使不确,也应该与实际的出版时间误差不会太大。

作,那么作为当期编辑,李大钊有充分的时间从熟悉的报刊之中收集材料继续充实自己的研究,以使“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更加科学丰满。上文所列举的《钱玄同日记》中,就出现过钱玄同轮值主编《新青年》时,在收稿截止前的一二日仍在撰写自己文章的有关记载。

四、结语

在没有原始文献(手稿)留下李大钊撰写、完成《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上)》时间线索的情况下,本文以跨语际比较法,以文本的思想源流作为参考维度,对中国近代新文本^①《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上)》的成文时间加以考证,基本的判断是:《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上)》1919年3月底或4月初开始撰写,5月基本完成,8月中旬旬定稿。

考察李大钊撰写《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的时间,对于李大钊生平思想研究的意义是,确定了李大钊在马克思诞辰101周年时即完成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转变;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史的研究价值是,确定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开始进入比较系统的传播阶段的时间是1919年5月;对于中日文化交流史的意义是,肯定了日本学者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成果为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起到了中介和桥梁作用。

参考文献:

- [1] 中共中央党史教研室. 中国共产党历史:第1卷(1921—1949)[M]. 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
- [2] 河上肇. マルクスの社会主義の理論的体系[M]//河上肇. 河上肇全集:第10卷. 东京:岩波书店,1982.
- [3] 李大钊. 李大钊全集: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 [4] 鲁迅. 鲁迅全集:第15集[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366.
- [5] 钱玄同. 钱玄同日记[M]. 杨天石,主编.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 [6] 李大钊. 李大钊全集: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 [7] 李继华. 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的核心论断与写作时间新探[J]. 中共创建史研究,2017(1):104—109.
- [8] 明生. 旅行杂感:12[N]. 每周评论:第34号,1919-08-10(4).

(责任编辑:李秀荣)

^① 王宪明认为,近代所有新文本都具有“四性”“四跨”,即:国际性、翻译性、混杂性、过渡性;跨文化、跨语际、跨语境、跨时代。详见王宪明:《中国近代思想史文献的基本特点及研究方法初探》,《史学研究》2014年第3期。